



1881 — 1981

紀念魯迅論文集

黄石师范学院

纪念鲁迅论文集

1881—1981

黄石师范学院中文系
黄石师范学院科研生产处

一九八一年九月

前言

一百年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阴风苦雨中，鲁迅诞生了。鲁迅的一生经历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一直站在时代的前列，为了祖国的独立、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解放奋斗终生，表现了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品质、坚贞意志和崇高节操。鲁迅从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走向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发展道路，显示了中国近代思想史整个的轮廓和发展趋势。鲁迅所走过的道路，正是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道路，是我们这个时代进步的典型道路。他以毕生的战斗实践向我们说明了十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够救中国。鲁迅的革命精神无疑将是激励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精神文明的一个伟大动力；鲁迅坚持的方向无疑将是我们“四化”征程中必须继续坚持的方向。因此，今天我们隆重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就具有无比深远的意义。

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的小说、杂文、散文等创作以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以鲜明的时代风格和民族风格为中国现代文学树立了典范。他所塑造的阿Q等典型形象至今仍然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宝库中闪耀着夺目的光芒。在我国文学理论

和美学的建设中，鲁迅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早在本世纪初，鲁迅便撰写了《摩罗诗力说》等文艺论文，在我国文论的发展中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以后，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在一次又一次激烈的论战和斗争中，鲁迅又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他对于艺术与政治、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的基本见解，他对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巨大革新，他对于批判继承问题的新的阐述，他关于文艺内部规律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真知灼见，他对于我国古代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的认真总结，都为我们留下了无比宝贵的财富，都是我们在建立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美学和科学的文学史时应该认真地加以学习和研究的。

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鲁迅是博大精深的。他敢于对人类积累的全部思想财富进行批判继承和探索，在此基础上，不仅建立了他的卓越、丰富的美学观，而且建立了他的卓越、丰富的哲学观、社会观、政治观、历史观、教育观、伦理观，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在为寻找真理而上下求索的过程中，鲁迅善于从历史和现实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教训，表现了敢于直面人生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表现了对于客观事物的实事求是态度和对于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高度辩证法思想，为我们树立科学的方法论提供了光辉的典范。

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鲁迅表现了革命的彻底性和坚定性。他是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战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在怎样使中国人民从精神上摆脱封建主义枷锁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进行了辛勤的思考和探索，他以文艺为武器对封建主义进行了激烈、沉重而深刻的批判。他对资产

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篇章。这一切对我们今天为建设“四化”而进行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鲁迅表现了硬骨头精神，表现了“俯首甘为孺子牛”为人民甘于牺牲自己的无私精神，表现了严以律己、勇于解剖自己、改造自己的自我革命精神，表现了“略小节而取其大”尽可能地多团结一些人的广阔胸怀。他反对“无特操”的市侩哲学，反对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盛行的奴颜媚骨习气，通过革命实践，他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极其亲密的关系，在国统区极其复杂、极其艰险的条件下，他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公开宣称将中国共产党人引为同志而感到光荣。这一切对于今天砥砺革命正气、振兴中华民族都将是光辉的表率和巨大的精神力量。

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从事文教工作的同志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鲁迅从1919年起，即开始提出“完全的解放”的教育观点，从此出发他逐步建立了彻底变革旧的教育制度和内容，在革命的原则下求得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体系。鲁迅多年从事大、中学教育实践。他曾先后担任过中学、中师的教师、校长，大学的教授、系主任、教务主任等职。他在教育工作实践中，努力以自己的身教和言教为青年树立榜样，帮助他们摆脱因袭的重担，去追求光明，成为德才兼备，有益于祖国人民的人才。

“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在那寒风肃肃、夜雾茫茫的旧中国，鲁迅的革命的远见卓识和乐观主义

精神坚信“千林暗”、“百卉殚”都只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必将扫荡寒风夜雾，贏来光明富强的新中国便。果然，鲁迅逝世后才十余年，新中国诞生了。三十年来，我们虽然经历了不少困难和曲折，但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贏来了建设“四化”的大好春光。我们纪念鲁迅，应该学习鲁迅的思想品质，努力实现鲁迅的遗愿。今天，我们仍然有不少困难，但我们只要具有鲁迅的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永远前进的彻底革命精神，具有鲁迅那种深挚、昂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鲁迅那样远大的革命理想和乐观主义精神，我们就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地获得建设“四化”的“新意匠”，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成霞照千林、百花争艳的蓬勃春山！

我们黄石师范学院是一所新建的院校，认真地学习和研究鲁迅更是我们建校树人的光荣使命。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还刚刚开始。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加强鲁迅研究的现实性、战斗性和科学性，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努力学习鲁迅对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学习他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感情，学习他“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发扬党的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值此纪念鲁迅诞生百周年之际，姑且让我们以这一束习作表达我们对鲁迅无比崇敬的心意和认真学习、研究鲁迅的决心，文轻情重，以待来兹。

长人而入国，斯于益宜。肴兼太廟，式如阳关，永逝去，时
雨风寒，罹玄。“山春并墨未可，留着深寒画飞飄”
义主康乐麻姑卓犖，故命革馅纸书，国中印白苦薄寒，集

目 录

- 逻辑的力量 艺术的魅力
- 略谈鲁迅杂文的写作特色 潘克明 (1)
- 继往开来的文论丰碑
- 读《摩罗诗力说》 阮国华 (29)
- 从“精神胜利”到“大团圆”
- 论阿Q的悲剧 陈敬中 (52)
- 鲁迅小说讽刺艺术初探 冯锡玮 (74)
- 《故事新编》的“油滑之处”
- 及其评价 安 镇 (93)
- 阿Q革命与辛亥革命 林植汉 (108)
- 古为今用的道路是广阔的
- 鲁迅的《故事新编》
- 与郭沫若的历史剧 董建华 (125)
- 发扬真美 以娱人情
- 鲁迅美育思想学习礼记 王念孔 (150)
- “遵命文学”与现实主义 马清明 (169)
- 鲁迅教育思想的核心
- 试论鲁迅“完全的解放”的
- 教育思想 黄芥田 (186)

逻辑的力量 艺术的魅力

——略谈鲁迅杂文的写作特色

潘 克 明

鲁迅说过，杂文并非“现在的新货色”，而是“古已有之”。现代杂文这种新的文学样式是继承中国古典散文和借鉴外国散文的产物。从鲁迅杂文中确实可以看得出同古代优秀小品，如魏末阮籍、稽康的“师心”、“使气”^①之作，唐末罗隐的“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陆龟蒙的“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以及明末“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的小品文字的渊源关系，也可看出外来的essay（随笔）和feuilleton（报纸的文艺栏）的影响。但到了鲁迅手里，杂文空前地被锻造成了无比锋利而切实，令反动势力闻之丧胆的轻武器，又被磨砺成了五四以来的新艺苑里光彩夺目的瑰宝。以至于使人们一说到鲁迅，就同杂文联系起来；一提起杂文，就想到鲁迅。鲁迅无可争辩地是现代杂文这种文学体裁的集其大成的开山祖。

鲁迅杂文的写作特色是表现于多方面的。他自己说过，

他的杂文之所以“杂”，是因为“不管文体，各种文体都夹在一处”，这就形成了他的杂文体制、文体多样性的特色。他的六百多篇、一百余万字的杂文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无比广阔、丰富多彩的艺术天地，内中政论、短评、杂感、随笔、书信、日记、序跋、抒情散文……，各种文体如千峰万壑，争奇斗美，群芳众卉，红绿纷陈。鲁迅杂文的特色还在于它的反映社会生活的迅速及时，针对性强。“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②。这时，杂文这种轻便犀利的形式就给了鲁迅以帮助，使他能“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由以上两点，又形成了鲁迅杂文涉及面广的特色。作者可以灵活自由地从各方面去反映波澜壮阔的现代生活，从各方面去剖露、抨击社会的时弊。政治、思想、文化、风俗人情……都被涉猎于作者的笔触之下。鲁迅杂文是一幅自辛亥革命前后直至抗日战争前中国历史的广阔而具体的图画，是一面旧中国光怪陆离的社会相的镜子。此外，“任意而谈”，“涉笔成趣”，“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等等，都是鲁迅杂文的特点。

但是，鲁迅杂文的总的写作特色是在于文艺性与政论性的结合。瞿秋白同志早在四十多年前指出的鲁迅杂文是一种“文艺性的论文”，至今仍然是对这种新的文学体裁的总的写作特色的最准确、最精当的概括。

鲁迅杂文是在反帝反封建斗争十分切迫的时候，作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作为匕首、投枪而创作出来的。他不论运用何种文体，从哪个方面，以怎样方式去直接、迅速地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都着意在“直薄旧社会

之柱石”③，“制强敌的死命”。这种战斗要求决定了这种文体的政论性。但是鲁迅的杂文不是一般的政论，他要求自己的杂文不仅“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血路”，而且“能给人以愉快和休息”。鲁迅曾提出艺术品要称得起艺术品，必须是“天物”、“思想”、“美化”三要素的有机统一④。

“天物”就是指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思想”就是指作品的思想倾向，“美化”则是指作品的美感魅力。倘若缺乏思想，自然不能算是艺术品；倘若不美，也称不上是艺术品。鲁迅的杂文同他的小说一样，都是精心制作的完整的艺术品，所以，他要求他的杂文不但能尖锐地抉发旧社会的病根，深刻地剖析旧社会的时弊，而且能给人以美感的享受。因此，鲁迅的杂文又是文艺性的政论。

政论文章和文学作品都是以反映和认识社会生活为目的的，就是鲁迅说的都在于“启人生之闷机”⑤。但它们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方式和对人的作用却是不同的。正如别林斯基说的：“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一个是证明，另一个是显示，……一个用逻辑结论，另一个用图画”⑥。鲁迅也说过：理论论著在“缕判条分”的“精密”上，长于文学作品，但文学作品却能将“人生诚理，直笼其辞句中，使闻其声音，灵府朗然，与人生即会”⑦。这又是理论论著所不及的。鲁迅的杂文则是把政论和文艺两种社会生活的反映方式巧妙而有机地统一起来了。它是说理的，充分运用逻辑思维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⑧。但这种说理又是形象思维的，是“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生动具体的，既能使人们从中学习和领会觉得到生活哲理和革命真谛，

又能使人们在美感情感上获得满足。

鲁迅杂文的这种写作特色同他的创作思想是紧密相联系的，是为他的创作思想所决定的。

鲁迅1933年在谈到自己创作小说的宗旨时，说他“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也就是要“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这自然也是他创作杂文的目的。而鲁迅认为，对于时弊“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所以他才丝毫不“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把杂文当作主要的战斗武器，“非这样写不可”，而且越写越多，越写越深刻犀利，越写越日见其斑斓。

与此同时，鲁迅又给自己规定创作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国民性的弱点”。他痛感颇多的群众受到长期封建制度的奴役和封建思想的毒害，精神上冷漠、麻木之深：安于充当“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也“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为此，他觉得抽象的议论，不足以唤醒“沉默的国民的魂灵”，而必须用“形象和图画”进行说理、论辩，既“启人思”，诉诸人们的理性，又“增人感”^⑨，诉诸人们的感性，给人以鲜明生动的具体感受，打动人的感情，这样才能使精神麻木的群众真正受到触动乃至震动，从而惊醒起来，振奋起来，自己动手来捣坏那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

鲁迅杂文的文艺性与政论性结合的特色之形成，同他主张作家要有强烈的爱憎感情也是完全分不开的。文学是运用形象思维来反映生活的。形象思维不同于逻辑思维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渗透了作者的美感情感态度。

这就是鲁迅所指出的，作家“得象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象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鲁迅自己正是这样。他对祖国人民充满了深沉真挚的热爱，甘做人民大众的“牛”，“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他对旧制度、旧思想和反动势力，则表现了刻骨铭心的憎恨，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抨击。对这些形形色色的敌人，他至死“也一个都不宽恕”。这种热烈分明的情感态度，就象养分溶化于水里一样，凝结体现在他的杂文中，从而增强了这种“文艺性的论文”的文艺性的因素。《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夜颂》等抒情意味浓郁的杂文自不待言了，就是那些议论性很强，形象描绘不多的杂文，仍然可以使我们从字里行间突出地感受到作者的那种炽烈的爱憎分明的感情。正是这种巨大的感情力量，扣人心灵，催人深思，使人们在“为之兴感怡悦”^⑩之中，心悦诚服地接受作者的复杂而深刻的思想。

二

鲁迅杂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战斗武器，显示了它的无比锋利。锋利，对于人民来说，表现在杂文代表了并直陈了他们的正义的心声，表达出了他们要求“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

了可诅咒的时代”，争取生存、温饱、发展的人的权利的意志和愿望；对于敌人来说，则表现在杂文毫不容情地彻底剥掉了这些“人面东西”的各种伪装，“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锋利，也表现在杂文真实而深刻地概括和反映了社会历史生活中某种本质和规律，引导人们登堂入室，达到他们虽然也企图探求但却达不到的光辉的真理境界。

鲁迅杂文之所以能发挥如此锋利的战斗作用，首先当然取决于作者的远远超出同时代一般进步作家的思想高度、理论修养和革命热情，取决于他的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同时也是他熟练掌握逻辑工具，运用逻辑思维“说服人”（别林斯基语）取得的成功所致。

当人们在从鲁迅杂文中学习、领悟“人生真理”的过程中，总是被文章内里的一种力量所吸引，所感动。严谨绵密的逻辑性就是构成这股吸引人、感动人的力量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正是鲁迅杂文的政论性的体现。列宁曾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能成为“现代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文献”^⑪，原因之一就是在于这部巨著的“基本思想”“是以稀有的逻辑力量严格遵行了的”。^⑫斯大林也叹服过“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说这种逻辑力量能“紧紧地抓住听众，一步一步地感动听众，然后就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他认为“列宁演说中的这个特点是他的演说艺术中最强有力的地方”。^⑬鲁迅杂文也正具有这样所向披靡的逻辑威力。

古时候战斗讲究“十八般武艺”。鲁迅的逻辑思维的武库里，锐利的兵器又何止“十八般”？他善于根据不同的战斗方式，针对不同的论战对象，选取最有效的逻辑手段进行

说理斗争，每战必胜，达到了熟练自如、得心应手的高度。就运用逻辑形式和逻辑方法之丰富多样而言，鲁迅杂文也是一座包罗万象、异彩迸射的宝藏，要全面发掘内中的奇珍异宝，绝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做到，下面仅举数斑以窥全豹。

援古例今，事实为证。鲁迅说过：“辩论事情，威吓和诬陷是没有用处的”，只有靠摆事实，讲道理。因为“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宣言”、“空言”打得粉碎。所以他的杂文从来不发空洞抽象的议论，更决不做从概念到概念的干瘪文字，而总是用充分的具体事例或历史事实来说理论证。

鲁迅思想开阔，学识渊博，从古到今，从中到外，浩瀚的知识海洋中，只要有助于论证自己所要说明的问题的，都能信手拈来，严密、精当地组织在自己文章当中。就以《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来说，出现在这篇不到三千字的讲话中的，有从西洋的“沙龙社会主义”到墨索里尼的宠儿、反动作家邓南遮，从向往“汉官威仪”的南社文人到对革命由热狂而失望、颓唐直至自杀的俄国诗人叶遂宁，从海涅的上帝和诗人的故事到《毁灭》中的美谛克，从前清读书人的“敲门砖”到资本家客厅里的“工人用的粗碗”……。这些事实材料，其涉猎之广，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鲁迅杂文中用作论据的事实材料不仅是充分的，而且都和要论证的主旨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因而从中能合乎逻辑地引出所需要的结论，发挥强劲的说服力量。例如《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主要论证的是“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的道理。鲁迅援用了周朝从武王伐纣直到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几个确凿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周王朝从建立

到巩固，主要都是靠的暴力，而决非行“王道”的结果。被誉为“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周王朝尚且如此，更何谈以后继承它的那些朝代呢！显然，这些材料和杂文中要论证的中心思想在本质意义上是紧密联系的，作为论据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论证性，令人信服地证明从中国历代反动统治者到日本侵略者所聒噪的“王道”乃是“妄言”，不过是他们和“霸道”交替使用的“牧师的职能”而已。

巧于设喻，善用类比。在鲁迅的杂文中，不论怎样深刻的道理，也不论多么复杂的问题，都能得到深入浅出、通俗平易的说明。原因之一，即得力于他的巧于比喻，善用类比。在他那里，比喻的运用不止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更重要的是起着论据的作用；类比作为逻辑推理的一种方法，则被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不从根本上触动旧社会的根基，只搞些点点滴滴的改良，花样再翻新，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这个道理本来不是几句话所能讲清楚的，但是鲁迅只用了一个“小鸟”的比喻就把它阐明了。他说：“拿一匹小鸟关在笼中，或给站在竿子上，地位好象改变了，其实还是一样在给别人做玩意，一饭一啄，都听命于别人。”用这个比喻来和“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和先前并无两样”的抽象道理类比，读者一下就对后者洞若观火了。

鲁迅用来作譬进行类比的事例，都是在他的思想光辉的烛照下，经过严格认真的选择的：首先总是选用人们容易理解的、熟知的、以至亲身经历过的生动事例；其次不停留在现象的比拟上，而是着眼于最本质的类似之点。这样来论证事理，使人既觉得平易亲切，又能获得深刻的启示。

《拿来主义》中的比喻、类比的运用是能说明这两点的。“大宅子”、“鱼翅”、“鸦片”、“烟枪和烟灯”、“姨太太”等等哪一样不是鲁迅那个时代的人们所熟知的？用这些来作譬，人们一读就懂，毫不费解。鲁迅指出，“拿来主义”者对待“大宅子”里的财富应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的态度：对“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它“有养料”就“象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是不用它来宴大宾”。这个比喻启示人们对待中外文化遗产中优秀的东西，不要因为它曾被剥削阶级所独享，就抛弃它，而应当批判地吸收过来，为人民所用；当然也不应盲目推崇，顶礼膜拜。“鸦片”，是文化遗产中那些含有一定消极因素，经过批判后则能起到一定借鉴作用的部分的比喻。对之既不要“摔在毛厕里”，又不要以其含毒，反倒兜售，而是“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就是加以批判的继承，剔除其中有害的成分，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创造新文化时的借鉴。“烟枪和烟灯”及“姨太太”自然都是比拟文化遗产中的糟粕，但对待它们也应有所区别。“烟枪和烟灯”可以“送一点进博物馆”作反面教材，但“姨太太”（这是比那些诲淫的东西）则只有“请她们各自走散”，如果也陈列出来等于帮助扩散，自然大不宜了。我们看，这一切比喻含意显豁，一层一层地发挥，对要阐明的事理紧密照应，有力印证，用以类比马克思主义的不应“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要“吸收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⑭的科学道理，是多么富有启发性！其所以能如此，不正是因为其间存在着由事物本身的逻辑所决定的一定的精神联系吗？

抓住要害，制命一击。鲁迅在论辩中，反对“历举对手之语，从头至尾，逐一驳去”的方法，主张“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以致命的重伤”。鲁迅杂文之所以战斗性这样强，很重要一个原因就在此。

梁实秋喋喋不休地兜售资产阶级“人性论”，摆出一付既不为资产阶级，又不为无产阶级，似乎是为“人类”说话的公正架势。鲁迅一眼就洞悉了并尖锐地揭露了他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他的理论主张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的实质，紧扣住这一要害，指出梁实秋对所有的人并未因“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而一律看待，而是一开始就“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继而判定“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和文学无缘”，嗣后又叫嚷“无产文学”“用不着高呼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梁实秋名为“人类”，实则“帮助有产阶级”的丑脸就暴露得一清二楚了。“第三种人”发了不少标榜“没有一定的党见”的议论，他们的全部“理论”都是建立在真正的作家应“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的“第三种人”这个谬论基础之上的。对此，鲁迅指出所谓“第三种人”“在现实世界中是没有的”。做不成这样的人，也自然“没有了第三种笔”，更“何况作品”？则“第三种人”写不出“第三种”作品，是怕被左翼文坛骂为资产阶级走狗的谰言，也就不攻自破了。鲁迅的子弹所击之处，也正是这些反动文人的致命伤。

揭穿矛盾，以毒攻毒。形形色色的敌人，无一不是同历史前进的潮流、人民大众的意愿背道而驰的，因而他们的一切言论、主张都必不可免地存在着逻辑矛盾。为了欺骗人